

※ 專題演講 ※

關於劉宋時期文學的幾個問題

川合康三* 著 陳俐君** 譯

很感謝受邀參加「劉宋的文本世界」研討會，並讓我有機會和諸位談談自己的看法。由於我不是劉宋時期文學的專家，因此想就編寫《文選 詩篇》譯注時所注意到的幾個問題，來和大家談談。《文選 詩篇》是從今(2018)年一月開始陸續出版的刊物，岩波文庫本，共有六冊，目前已刊行了四冊，應能在明年上半年左右出版完六冊。雖然日本已有兩種《文選》全卷譯文，但因都是編於五十至三十年前，頗為早期的刊物，所以我等六人花了十年時間，針對《文選》詩作部分編寫了新的譯注。因是六人共著，在日本就戲仿《六臣注文選》的說法而稱其刊物為《六人注文選》。雖然有人對於像《文選》如此艱澀的典籍，採用傾向大眾讀物的文庫本的方式出版，抱持著不看好的態度，但出乎意外地，《文選 詩篇》的銷售量頗佳，這似乎表示了中國古典文學在日本仍有不少讀者和愛好者。

接下來，我想針對劉宋時期的文學提出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從玄言詩到山水詩的變化——風景的發現」。劉宋文學的新變化之一，為《文心雕龍·明詩》所指的「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即是玄言詩到山水詩的轉換。由於歷來沒有存留太多玄言詩，而無法完全明白玄言詩究竟為何物，我想姑且先將其當作是藉由詩的語言闡述老莊思想的作品。在稱作山水詩之祖——謝靈運的作品裏，所展現的風景並不是純觀賞的風景，其風景裏蘊含了宗教性，且其山水詩尤其展現了佛教境界。無論如何，劉宋時期對於自然產生了新見解的這一點，是無庸置疑的；至於為何有了這一變化，我想試著從兩個方面去談。

本文為2018年10月25日川合康三教授於本所舉辦之「劉宋的文本世界：跨學科的探索」學術研討會上所發表的主題演講。

* 川合康三，日本京都大學名譽教授。

** 陳俐君，日本京都大學文學研究科碩士。

首先，是南渡引發了人們對所處世界的改觀。南渡之前的詩，除了唯一的南方文學《楚辭》以外，起自《詩經》，連同可稱作真詩源起的建安文學，都是以中原這一地區作為中心的創作產物。因政治、文化中心皆在中原，對於自然景象、風土氣候的理解，亦是以中原地區為本。到了西元三一七年，自從東晉建都於建康，南方才成為政治、文化的中心。後來整個六朝時期，中國傳統文化轉變成由南朝王朝來繼承，北方中國則交由北方民族所形成的北朝王朝繼承。北朝王朝不但吸取了南朝王朝所肩負的傳統文化，也開創出了獨樹一幟的北朝文化，因此近幾年北朝文化頗受人矚目。然而，我仍認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中心在南方，是由南方王朝繼承了傳統文化。

文化中心向南方遷移這一轉變，對於中國社會、文化等造成了極大的意義。無論是社會或是文化，都與其運行之地脫離不了關係，無論是社會或是文化的基本形態，都取決於在何地而成、在何地被形塑，因為社會、文化是根著於土地的產物。孕育於中原地區的中國傳統文化，隨著南渡而失去了所依憑的根本，這情形應該產生了比王朝交替更大的變化。南渡所引起的變化，是一個應該從各方面加以探索的問題，因此我想先試著從「對自然的看法」來談這問題。《世說新語·言語》裏記載了這段敘述：

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周侯〔周顛〕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淚。唯王丞相〔王導〕愀然變色曰：「當共勦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

文中「風景」並不是“landscape”的意思，應該是指「風」和「光」。吹拂而過的風、灑落一地的光，雖不依地域而有不同，但是風所吹拂而過的、光所灑落的山川等地形，並不是中原所見之物。「山河」二字有異文，依據朱鑄禹《世說新語彙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出版），可見到二字在《晉書·王導傳》作「江河」、敦煌本作「江山」、《通鑑·永嘉五年》作「江河」等。朱氏推測這二字在《世說新語》本作「江山」，後來被改寫成「山河」。此則內容呈現了失去北方領土的人們所散發出的悲哀之情，誘發了在場人們的共鳴，而讓眾人悲傷落淚，且傳達了東晉的人對於失去北方領土，是多麼地懊悔不已的心情。同樣是為了失去領土而歎息的東晉元帝的故事——年幼的東晉明帝說了「舉目見日，不見長安」這一句話（《世說新語·夙惠》），而元帝、明帝的故事就此戛然而止，在座人們的悲哀之情則作為一種余韻，迴盪於文字之間；然而，「自有山河之異」這則故事比起元帝、

明帝的故事，更表現出了欲奪回北方領土的企圖。

人若持續住在同一塊土地上的話，並不會有意識地去區分周遭所見的山川，因為這是平日常見的風景，不會刻意地去注視自己習以為常的外在世界。當人們遷移至與中原地區完全不同的地方時，映入眼簾的各處風物情貌，樣樣都是新奇的，此時的山水即向人們顯現了自己的存在。雖然《世說新語》的故事是以東晉時期作為故事的舞臺，但以南渡作為一種契機，促使人們開始敏銳地去意識到，這樣子的山水不就和「風景的發現」相關了嗎？雖然我和大家談了南渡應可說是使得人們以新視野去觀看風景的一個開端，但這是因應被觀看的對象——自然本身產生了變化而推論出來的。除了觀看對象的變化這一因素以外，尚有一個待考量的因素，即是觀看方式的改變。

話說回來，對人而言，風景究竟存有什麼意義？追溯至上古，認為眺望風景是帶有巫術性質。在日本會有某地的支配者為了能將領土盡收眼底而登上山丘，且在山上舉行祈禱萬物豐收的儀式；在中國似乎也有相同的儀式。中國的「望祭」應是指這登高祭祀的儀式，在日本則稱作「國見」；直至今日，日本各地仍留有「國見」這一地名。《晏子春秋》等典籍裏，都記載了齊景公登牛山，舉辦宴會與家臣同樂之事（《列子·力命》、《韓詩外傳·卷十·第十一章》、《太平御覽·卷四二八》所引的《新序》、《春秋左氏傳·昭公二十年》等皆有同樣的記載）。《晏子春秋·內篇諫上·景公登牛山悲去國而死晏子諫》：

景公遊于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若何去此旁旁而死乎？」艾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晏子獨笑于旁。公刷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涕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常守之矣；使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則吾君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于君也。而獨為之流涕，是不仁也。不仁之君見一，諂諛之臣見二，此臣之所為獨竊笑也。」

不但《晏子春秋》裏的幾處都可見到這故事，在其他典籍裏亦可見其記載。登牛山與家臣一起宴遊同樂的齊景公，在最歡樂的時候哭了出來，原來是齊景公突然想起，自己終究有一天仍必須捨棄今日所眺望的風景而死去，不禁悲從中來。看到這情形的晏子卻笑了出來，對於晏子行徑感到怪異的齊景公就問晏子，晏子則說：「人就是前人死去後，後人才誕生出來的。如果古人都一直活著，那麼景公您現在就不在這世上了。」雖然這是一則以敘述晏子生死觀為主旨的故事，但脫離這一主

旨，我們也能從中截取、解讀眺望自然一事所蘊含的意義。景公登牛山與家臣一起宴遊同樂之事，是上古時期君主登高處、眺望領土以祈求萬物豐收的「望祭」這一儀式，但這一儀式到了齊景公時期變得徒有形式而無內涵的表現；由此可知，登山陵而眺望風景，從帶有祭祀性質之義轉變成君主與家臣宴遊同樂之事。與《晏子春秋》相似的情形，也出現在西晉的羊祜故事裏。《晉書·卷三四·羊祜傳》：

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歎息，願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襄陽百姓於峴山祜平生遊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為墮淚碑。……

這故事主要講述：好天氣的某日，羊祜登峴山，並與家臣宴遊同樂，在最盡興的時候，羊祜想起古時候曾經登過此山，享受過這片風景的人們，至今任何一人都不存在於這世上；與這些人們相同，自己終究也會離開這世界，想至此，不禁流下淚來。在山上宴遊同樂，並在宴會最盡興時，因想起自己終究難逃一死而落淚的這一敘述內容，與上述所引的齊景公故事相吻合，只是羊祜故事裏，並未出現像晏子這般依理來曉諭生死之事的人物，跟隨羊祜的家臣們僅是與羊祜一起悲嘆。羊祜故事似乎更能引起人們的共鳴，後來的詩人常將此故事作為典故，運用於詩裏。

從齊景公和西晉時期羊祜的故事，可知觀賞風景成為君主與家臣同樂的場合。眺望風景是人間極樂之一，也可從告戒君主別過度沉溺於其他如享受美食、女色、音樂、飲酒、打獵等同樣極樂的敘述裏，得到解答。《戰國策》、《淮南子》、《說苑》、枚乘〈七發〉等文獻裏，都記載著君主應該抑制沉溺於觀景的享樂裏。

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寐（姚宏注：寐，快也。鮑彪注：寐，口有所銜也，言不善食），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

易牙之調也。左白臺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戰國策·魏策二》）

莊王曰：「吾聞子具於強臺。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淮南子·道應訓》）

楚昭王欲之荊臺游，司馬子綦進諫曰：「荊臺之游，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使人遺老而忘死，人君游者，盡以亡其國。願大王勿往游焉。」（《說苑·正諫》）

客曰：「既登景夷之臺，南望荊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其樂無有。」（枚乘〈七發〉，節錄自《文選·卷三四》）

從上述引文可知，君主與臣子一邊盡興於宴饗，一邊享受美景的這一形式，是種眺望山水的習慣。除了君主和臣子一起眺望、享受風景以外，一般人眺望風景的時候也是和友人一同出遊行樂，享受美景。這類內容也可見於陶淵明的詩，如〈遊斜川（并序）〉：

（序）辛丑正月五日，天氣澄和，風物閒美。與二三鄰曲，同遊斜川。臨長流，望曾城，魴鯉躍鱗於將夕，水鷗乘和以翻飛。彼南阜者，名實舊矣，不復乃為嗟歎，若夫曾城，傍無依接，獨秀中阜，遙想靈山，有愛嘉名。欣對不足，率爾賦詩，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各疏年紀鄉里，以記其時日。

開歲倏五十，吾生行歸休。念之動中懷，及辰為茲遊。

氣和天惟澄，班坐依遠流。羽湍馳文魴，閒谷矯鳴鷗。

迴澤散游目，緬然睇曾丘。雖微九重秀，顧瞻無匹儔。

提壺接賓侶，引滿更獻酬。未知從今去，當復如此不。

中觴縱逸情，忘彼千載憂。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

這作品體現了陶淵明此人的性情——縱使懷抱生死煩憂，也要和友人一同享受美景。直至〈停雲〉一詩，詩的主題變成了感嘆美景在前，但應與自己同樂的友人卻不復在的內容。內容如下：

靄靄停雲，濛濛時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
 靜寄東軒，春醪獨撫。良朋悠邈，搔首延佇。
 停雲靄靄，時雨濛濛。八表同昏，平陸成江。
 有酒有酒，閒飲東窗。願言懷人，舟車靡從。
 東園之樹，枝條再榮。競用新好，以怡余情。
 人亦有言，日月于征。安得促席，說彼平生。
 翩翩飛鳥，息我庭柯。斂翮閒止，好聲相和。
 豈無他人，念子實多。願言不獲，抱恨如何。

陶淵明的作品裏，最有名的〈飲酒·其五〉裏的一句「悠然見南山」，即表現了獨自一人看見南山的情形。這不是在宴會中享受的山，也不是和親近的朋友一起眺望的風景，而是透過獨自一人迎向山陵，從中體會出自己與「南山」之間妙不可言的關係。作為山水文學之祖的謝靈運，也創作了不少感嘆眼前雖有山水美景，卻無一同賞翫之人的詩。如〈晚出西射堂〉：

步出西城門，遙望城西岑。連郭疊巘嶸，青翠杳深沉。
 曉霜楓葉丹，夕曛嵐氣陰。節往戚不淺，感來念已深。
 羈雌戀舊侶，迷鳥懷故林。含情尚勞愛，如何離賞心。
 撫鏡華緇鬢，攬帶緩促衿。安排徒空言，幽獨賴鳴琴。

〈遊南亭〉：

時竟夕澄霽，雲歸日西馳。密林含餘清，遠峯隱半規。
 久痾昏墊苦，旅館眺郊歧。澤蘭漸被逕，芙蓉始發池。
 未厭青春好，已覩朱明移。感感感物歎，星星白髮垂。
 藥餌情所止，衰疾忽在斯。逝將候秋水，息景偃舊崖。
 我志誰與亮，賞心惟良知。

〈登石門最高頂〉：

晨策尋絕壁，夕息在山棲。疏峯抗高館，對嶺臨迴溪。
 長林羅戶穴，積石擁基階。連巖覺路塞，密竹使徑迷。
 來人忘新術，去子惑故蹊。活活夕流駛，噉噉夜猿啼。
 沉冥豈別理，守道自不攜。心契九秋幹，目翫三春萋。
 居常以待終，處順故安排。惜無同懷客，共登青雲梯。

對謝靈運而言，山水也是應與心靈契合的朋友一同玩味欣賞的對象。獨自一人與風

景相對的他，常常感嘆知己友人不在，並抒發自己賞翫行為無法得到滿足的遺憾。然而，謝靈運從希望與友人一同遠眺風景的想法、友人不在的感嘆跳脫出來，進一步展現了觀照風景的一面。如〈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一詩：

朝旦發陽崖，景落憩陰峯。舍舟眺迴渚，停策倚茂松。
側逕既窈窕，環洲亦玲瓏。俛視喬木杪，仰聆大壑濃。
石橫水分流，林密蹊絕蹤。解作竟何感，升長皆丰容。
初篁苞綠箨，新蒲含紫茸。海鷗戲春岸，天雞弄和風。
撫化心無厭，覽物眷彌重。不惜去人遠，但恨莫與同。
孤遊非情歎，賞廢理誰通。

在描寫山和湖的風景之後，謝靈運在結尾四句述說了：「遠離世間並不可惜，可惜的是沒有與自己一同玩味的人，可是他並不對獨自一人前來此地感到悲歎。若停止觀照山水這一行為的話，就無法體悟到隱藏在山水之中的『理』。」此時的謝靈運停止了他在其他詩裏表現出的感嘆友人不在的情緒，道出了因自己與山水相對而使得「賞」有了可能性，並且依其「賞」而能達到「理」的境界。謝靈運透過眺望山水而求取隱藏在山水之中的「理」——形而上的原理。此處的山水早已完全被賦予了與享樂之義截然不同的意思，詩人在山水之中尋求著道理之顯現，而其道理也應可說是具有宗教性的啟示。

尚須留意的是，陶淵明、謝靈運所見的風景並不是著名的山陵或河川，而是出自於無人知曉的偏僻之地所展現的自然景觀。和有名的大山、江河不同，正因這些偏僻之地的風景並不是那些具有意義的名物，詩人們才能從中看出自身意義之所在。陶淵明獨自一人相對的「南山」、謝靈運所遊賞的永嘉、始寧的山水，對詩人們而言，他們並不是將這些山水視作「美麗之物」去觀看它們，而是從山水之中感悟形而上的意義；又或許對詩人們而言，這就是一種「美」。原是眾人一起同樂的風景，隨著觀看方式變成一人獨自面對風景時，就能發現到其他不同的意義。本來作為眾人歡娛對象的山水，因觀看者轉變成獨自一人，而使得新意義得以被發現，這或許可視作山水詩的誕生。

劉宋時期文學的第二個問題，即是文學與政治緊密相連的關係；而二者緊密的關係甚至會讓人認為，當時的文學是作為傳達政治訊息的一種手段。雖然這是起於六朝時期肩負文學事業的人們，同時也是在政治世界位居重要地位的人物——就是文學家和政治家一體的結構。但是在具有同樣情形的南朝梁，以皇族為首，當時位

居權貴的人們也都愛好文學，果然不論當時具代表性的文學家是否就是當時地位最高的政治家，與劉宋時期相比，南朝梁的文學與政治之間仍保持了距離，且從中似乎可看出文學與政治分離的各種情形。我想謝靈運和顏延之是足以代表劉宋時期此種文學與政治密不可分、文學作為傳達政治訊息之手段的文學家。謝靈運作有〈述祖德詩〉二首，這作品收錄於《文選·卷十九·述德》。〈述祖德詩·其一〉如下：

達人貴自我，高情屬天雲。兼抱濟物性，而不纓垢氛。
 段生蕃魏國，展季救魯人。弦高犒晉師，仲連卻秦軍。
 臨組乍不緜，對珪寧肯分。惠物辭所賞，勵志故絕人。
 苕苕歷千載，遙遙播清塵。清塵竟誰嗣，明哲時經綸。
 委講綴道論，改服康世屯。屯難既云康，尊主隆斯民。

〈其一〉開頭四句，先從「達人」開始了詩的敘述，「達人」有崇高的精神，雖救濟世人蒼生，但卻沒被塵垢俗氣汙染。接下來四句列舉了以前「達人」的例子，陳述了段干木、展季（柳下惠）、弦高、魯仲連這四人因處在春秋戰國而拯救國家免於危難的史實，這些人都成就了第三句「兼抱濟物性」裏「濟物」（救濟世人蒼生）的功績。然而，謝靈運強調的並不是他們的功績偉業，而是他們成就偉業後的態度。就如接續的後四句所示，這四人都拯救了國家，卻不爭取與功績相當的賞賜，反而婉拒昇官，選擇退出政治舞臺。建功立業卻不求取官祿賞賜的行為，早在《老子·第九章》即曰：「功成名遂而身退，天之道也。」西晉左思〈詠史八首〉裏也不時地讚揚建立功績卻不爭取賞賜的態度，並且表露了期望自己能有如此態度的想法。以這種態度作為一種理想立身處世，在謝靈運其他詩作、鮑照〈詠史詩〉，甚至到了李白〈古風〉都持續存在著。

〈述祖德詩·其一〉接著敘述了「達人」們恬淡無欲的態度，是作為一種流芳後世的美德，之後的「清塵竟誰嗣」一句帶出了詩人的探問：現在是誰繼承此種美德？「明哲時經綸」一句即進入了主旨，雖然並未明白道出祖父的名諱，但從「述祖德」這一詩題，即可曉得「明哲」是指謝靈運的祖父——謝玄。從此處開始，詩就轉變成敘述與謝玄相關的內容。最後四句呈現了正當國家存亡之際，原本是「文」的人棄文就「武」，平復戰亂，其結果則以恢復太平作結。在第一首〈述祖德詩〉裏，完全沒有具體地敘述謝玄的實際作為以及其事蹟，只將謝玄列入古時候「達人」之一，且將其作為體現「功成身退」這一美德的人物，褒獎讚揚一番而已。關於謝玄的具體事蹟，則呈現在〈述祖德詩·其二〉裏：

中原昔喪亂，喪亂豈解已。崩騰永嘉末，逼迫太元始。
 河外無反正，江介有蹙圯。萬邦咸震懾，橫流賴君子。
 拯溺由道情，龕暴資神理。秦趙欣來蘇，燕魏遲文軌。
 賢相謝世運，遠圖因事止。高揖七州外，拂衣五湖裏。
 隨山疏濬潭，傍巖藝粉梓。遺情捨塵物，貞觀丘壑美。

全詩從起於永康元年(300)的八王之亂，以及發生於永興元年(304)的五胡十六國之亂的內外之亂，開始了詩的吟詠。事件再加上年號的呈現方式，讓敘述顯得更為具體真實；西晉王朝因「永嘉」之亂而滅亡，「太元」是指苻堅勢力壓迫東晉之事。接下來的四句敘述了當全國陷入令人惶恐的混亂時，人們所仰賴的「君子」即是祖父謝玄。東晉武帝在位的太元八年(383)八月，苻堅發動大軍，南下進攻，謝玄大敗了南下的苻堅大軍，而取得勝利，這正是〈其一〉所言之功績的具體內容。實際上，史書也記載著在淝水之戰中，是謝玄的存在決定了東晉的勝利。在接下來的四句，記載了謝玄不僅化解危機，拯救了東晉，北方的人們也祈望東晉能收復北方。東晉也欲乘著淝水之戰的勝利氣勢，一鼓作氣地進軍北方，奪回北方領土。謝玄奪回了彭城，謝玄的部下劉牢之則攻下了甄城。然而，接續的四句敘述了北伐計畫的失敗、謝玄退隱官場之事，造成情況乍變的原因是「賢相」——謝玄的叔父——謝安之死。原本謝玄就是在謝安的推薦之下，拔擢成與苻堅對抗的武將，謝安之死使得謝玄頓時失去了後盾，加上當時的東晉王朝反對謝安、謝玄北伐計畫的勢力之中，有簡文帝之子——司馬道子這一強大的阻力。因此，謝安的死促使東晉政策有了重大轉變，北伐計畫就此中止。最後四句敘述謝玄離開官場，過著隱逸生活，滿足於遠離世俗的人生。

以上是〈其二〉的全詩梗概。〈其一〉僅僅敘述了謝玄建立功績卻不求回報的態度，將其與古時候的達人並列為品格高潔的人物，並沒有陳述謝玄的具體事蹟。到了〈其二〉，揭示了謝玄的功績即是在淝水之戰為東晉取得勝利之事，而且敘述了謝玄因後來的政治變化而隱退之事。〈其二〉所敘述的西晉王朝因內憂外患而滅亡，東晉也因苻堅大軍的南下而陷入危機。當時出現了奮戰不懈的謝玄在淝水之戰中取得勝利，謝玄並欲乘其勢，企圖奪回北方失土，但因謝安之死而使得壯舉功虧一簣。到目前為止，詩中敘述與歷史事實並未有太大歧異，但是接下來的敘述卻不符合史書的記載。北伐計畫遭受扼殺之後，雖然〈述祖德詩〉呈現的是謝玄離開官場而隱居，但依據《晉書·謝玄傳》所述，謝玄乃因患病而無法任職，才呈上疏以

求辭任。雖然以生病為由而辭官，是件司空見慣之事，但事實上謝玄卻在四十六歲仍任官職的情況下病歿，沒有發生如詩所示：「離開官場而隱居」這件事。與事實不符的尚有一處，即是作為〈其一〉敘述主軸的「建功立業卻不求賞賜」之事；事實上謝玄憑藉著功績而升官，被授與了康樂縣公之爵位。

扭曲事實而寫成〈述祖德詩〉的動機為何？謝玄確實是戰場上的勝利者，但卻是後來官場上的失敗者，而美化了謝玄官場敗仗的就是〈述祖德詩〉。北伐政策遭到拒絕的不只有謝安、謝玄，實際上謝靈運也是其中一人。在《宋書·謝靈運傳》裏，記載了謝靈運也在元嘉五年(428)向南朝宋文帝上書進諫北伐一事，但並未被採納，而謝靈運則「以疾歸東」，返回故鄉始寧。雖然無法確認〈述祖德詩〉是何時寫成的作品，但詩中所敘述的謝玄事蹟，卻與謝靈運的遭遇是重疊的。不但如此，〈其二〉結尾處所敘述的隱逸生活，與謝靈運〈山居賦〉的內容重疊，可見〈其二〉裏呈現的謝玄隱居非屬事實，寫的是謝靈運自身的隱居生活。

若僅讀〈述祖德詩〉的表面敘述，似乎只能看到這是謝靈運讚揚祖父謝玄的作品，但若將謝玄和謝靈運二人的事蹟重疊比較，就能明白這作品實際上充滿了謝玄和謝靈運的悔恨——企圖北伐卻未被採納，從而退出官場的怨恨心情，說起來這就是「怨恨的文學」。乍看是讚揚「祖德」、符合文學規範的作品，但作品背後充滿著在此種政治情勢下遭受政治打擊的怨念；換言之，按照四平八穩的形式所寫的〈述祖德詩〉是一部謝靈運對政治充滿怨恨而完成的作品。文學作品作為隱藏此種政治性訊息的載體，或許是劉宋文學的特色之一。

在如此與政治情勢有著緊密關係之中所寫的文學，與謝靈運齊名的顏延之的作品，亦是其中一例。顏延之〈五君詠〉(《文選·卷二一》)也是表面上看起來是讚揚竹林七賢裏的阮籍、嵇康、劉伶、阮咸、向秀五人的作品。《宋書·顏延之傳》記曰：

元嘉三年，羨之等誅，徵為中書侍郎，尋轉太子中庶子，頃之，領步兵校尉，賞遇甚厚。延之好酒疎誕，不能斟酌當世，見劉湛、殷景仁專當要任，意有不平，常云：「天下之務，當與天下共之，豈一人之智所能獨了。」辭甚激揚，每犯權要。謂湛曰：「吾名器不升，當由作卿家吏。」湛深恨焉，言於彭城王義康，出為永嘉太守。延之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詠嵇康曰：「鸞翮有時鍛，龍性誰能馴。」詠阮籍曰：「物故可不論，塗窮能無慚。」詠玩咸曰：「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

守。」詠劉伶曰：「韜精日沉飲，誰知非荒宴。」此四句，蓋自序也。湛及義康以其辭旨不遜，大怒。時延之已拜，欲黜為遠郡，太祖與義康詔曰：「降延之為小邦不政，有謂其在都邑，豈動物情，罪過彰著，亦土庶共悉，甚欲選代，令思愆里閭。猶復不悛，當驅往東土，乃至難恕，自可隨事錄治。殷、劉意咸無異也。」乃以光祿勳車仲遠代之。延之與仲遠世素不協，屏居里巷，不豫人間者七載。

從《宋書》所記可知，顏延之和獨攬大權的劉湛、殷景仁的關係不好，因此劉和殷二人透過彭城王劉義康，將顏延之貶謫為永嘉太守，顏延之為此而怒作〈五君詠〉。劉湛與劉義康因〈五君詠〉所透露出的不遜態度而大怒，結果顏延之也沒能任職永嘉太守，不得不隱居七年，直到元嘉十七年(440)劉湛被誅殺後，顏延之才得以返回朝廷。顏延之因〈五君詠〉而惹惱了當朝權貴，落得長年來飽受不遇的下場。《宋書》記作「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這一敘述，顯示了將七人視作七賢的這一概念，在劉宋時期已成形。顏延之在〈五君詠〉一詩裏舉出的五個人，都是為了貫徹自己的人生信念而不容於世、飽受不遇之苦的人。如「此四句，蓋自序」所示，顏延之將因劉湛、殷景仁而遭到排擠之事，寄託於〈五君詠〉裏的五人，以訴其事；作者自身的創作動機裏，企圖批評劉湛、殷景仁二人的行徑，而劉湛、殷景仁也因此欲貶黜顏延之。雖然詠史詩絕非僅是吟詠過去的人物、歷史事件，詩中寄託了作者自身懷抱是常有之事，但是詠史詩在現實生活裏造成如此的影響，卻是少見的，由此足以顯現劉宋時期的文學作品與政治情勢密不可分的關係。

最後，我想稍微談談生於東晉到劉宋時期的文學家——陶淵明。《文選》裏收錄了八篇陶淵明的作品，和陸機五十二篇、謝靈運四十篇、顏延之二十一篇相較，陶淵明八篇的這一數目——至少從後世對陶淵明的評價來看——似乎頗少。蘇軾時常批評昭明太子所編纂的《文選》，而其中所收錄的陶淵明作品量偏少，也是蘇軾批評的一點。昭明太子雖是晚於陶淵明一百多年左右的人物，但眾所皆知的，他是較早喜愛陶淵明作品的人。據我所知，他是最早編纂陶淵明的文集，且為其寫了〈陶淵明集序〉的人，甚至也留下了別於文集內容的〈陶淵明傳〉。我認為，《文選》所收錄的八篇陶淵明作品，應是在《文選》這部欲標立文學規範的總集裏，昭明太子竭盡心思所收錄的八篇。總之，八篇陶淵明作品，是喜愛陶淵明作品的昭明太子在自己的個人喜好與具有文學規範性質的《文選》相衝突之下，盡可能選出了篇數。換句話說，這表示陶淵明的文學是不符合當時文學規範的。

整個魏晉南北朝時代，除了民間樂府，文學都是由當時階層最高的人們所作成的，這些人幾乎都是王朝政治權力的中心人物，而且創作文學的地方也是以首都為主。在文學環境是帶有如此支配性的時代裏，也只有陶淵明沒有相當的官位，且在遠離都城之地，獨自一人編織著與眾不同的文學。陶淵明的文學之所以超越時代，應是他身處與其他人不同的環境，正因為在這樣子的環境，有了這樣子的境遇，才構造出前所未見的文學。然而，陶淵明在同時代有了一位知己，那就是顏延之。顏延之曾有至少兩次與陶淵明直接相見的機會。最初的一次是義熙十一年(415)，顏延之跟隨著江州刺史劉柳一同前去潯陽時，就和陶淵明維持了一年多的友誼；當時顏延之三十二歲，陶淵明五十一歲，二人的友誼可說是忘年之交。第二次是在景平二年(424)，顏延之被貶謫為始安太守之際，在赴任途中，順道去了潯陽與陶淵明見面，此時顏延之四十一歲，陶淵明六十歲。陶淵明逝世後，顏延之作〈靖節徵士誄〉，這是最早的陶淵明傳記資料。

顏延之與陶淵明的相遇看起來就像是奇蹟。身在距離中央文壇遙遠之處，卻能出現在六朝文學舞臺的人，陶淵明應可說是絕無僅有的存在。而他與顏延之第一次的相遇大概是出自於偶然，因緣際會之下，顏延之因職務之需而前往潯陽，有了與當地文人交流相識的機會。縱使顏延之第一次與陶淵明的相遇是出自於偶然，但之後還能持續交遊來往的原因，不外乎是顏延之承認了陶淵明的文學；即使一開始二人的相遇是偶然的，但讓他們持續交流的並不是偶然，而是種必然，將偶然反轉成必然的是，顏延之在文學上具有的獨到眼光。不過無論是顏延之，或是之後的昭明太子，他們自身的文學裏都未能看到陶淵明的影子。這是因為陶淵明的文學過於超前，縱使明白其文學價值，都尚未能將其融入於自己的文學之中。真正繼承陶淵明文學，而且將其文學發展開來的，不得不等到杜甫的出現。因優異的文學常常都是超越時代的產物，到了真正被接受為止，必須經過長久的時間，例如：引入以自己的孩子作為文學題材般地、具有私人性質的文學，或者表現一種自虐性的自我幽默，杜甫繼承了這些面向的陶淵明文學，甚至將其得到進一步的發展。

話雖如此，不僅限於顏延之、昭明太子，估計陶淵明的文學應該在六朝時期出乎意料地廣受好評。其中一個理由，即是有許多收錄在《文選》以外的陶淵明作品，都被保存了下來。六朝文人的情形——包括上述所提及的謝靈運和顏延之——除了收錄於《文選》以外的作品，極為少見。大部分六朝文人的作品幾乎只存留在《文選》裏；陶淵明是個較多在《文選》以外的作品被保存下來的例外，這會不

會與像昭明太子所編纂的《陶淵明集》這樣的陶淵明別集的廣泛流行有關？生於隋唐之際的王績是作為隱逸者陶淵明的繼承者，王績的〈五斗先生傳〉很明顯地是源自於陶淵明〈五柳先生傳〉，〈自撰墓誌銘〉應該也是模仿陶淵明〈自祭文〉的作品，王績的文章中敘述了出現在王績周遭，而現今不知其名的陶淵明愛好者。在整個六朝時期，具有如此重要存在的陶淵明，恰好出現在東晉、劉宋時期之間，如何將其出現與劉宋時期的整個文學環境做一連結，這也可說是今後待解決的問題。

我談了關於劉宋時期文學的三個問題，在陶淵明、謝靈運、顏延之這些重要人才輩出的時代，應可視作是文學以各種形式逐漸趨於穩定的時期。百年之後的六世紀上半葉，尤其在上半葉最初這短短三十年期間裏，出現了至今看來仍具有重要意義的總集和文學論——《文心雕龍》、《詩品》、《文選》、《玉臺新詠》等四部經典，這四部經典是各自帶有對照性的書籍。相對於《文心雕龍》與《詩品》作為文學論的書籍，恰好與《文選》、《玉臺新詠》這兩部作為總集的書籍，形成對照。即使同為文學論，《文心雕龍》進行了文學應是如何的概論性討論——即是所謂的文學理論，《詩品》則是品評具體作品優劣的文學批評；即使同是總集，相對於《文選》是精挑細選出符合文學規範的作品，《玉臺新詠》則是艷詩總集。不但如此，相較於《文心雕龍》與《文選》所涵蓋之對象是當時所有可視作文學的體裁，《詩品》與《玉臺新詠》則僅以詩作為討論對象。這四部書籍各自皆帶有對照比較的關係，這樣子的對照比較關係，甚至會讓人以為這四部書籍似乎各自意識到了其他書籍的存在。這四部書籍集中出現在西元四九九年至五三四年這一極為短暫的時期，說明了正因為這時期的文學已發展得十分成熟，才可能發生此種情形。我認為，或許是在先前的劉宋時期出現過許多重要文學家的這一因素，促使南朝梁的文學達到成熟穩定的階段。

